

《鹊桥仙·七夕》与诗人秦观

章雪峰

《鹊桥仙·七夕》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北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七月初七，一年一度的七夕节日，前一年被再度贬官来到郴州，正在郴州“编管”的秦观，挥笔写下这首《鹊桥仙·七夕》。

整篇读来，一气呵成，脍炙人口。在有关中国情人节“七夕”的诗词之中，这是最好的一首。秦观之前或之后，无人出其右。可见，秦观在宋词史上，被称为“词家正宗”“词家正音”“今之词手”，是当之无愧的。尤其是这首词中的“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早已是国人情话、情书中高频率引用的金句，历来也受到高度评价。明人沈际飞评价说：“世人咏七夕，往往以双星会少离多为恨，而此词独谓情长在朝暮，化腐朽为神奇！”清人黄钧宰《金壶七墨》评价本词最后两句“理足辞圆”。

这首词的词牌《鹊桥仙》，最早见于欧阳修《鹊桥仙·月波清霁》词中的那一句“鹊迎桥路接天津”，并由此产生词牌名。《鹊桥仙》还有多个别名，比如《鹊桥仙令》《忆人人》《广寒秋》等。而从秦观的这首词开始，这个词牌名还被称为《金风玉露相逢曲》。

写下《鹊桥仙·七夕》之时，秦观49岁。此时的他正处于一生的最低谷，也开始了生命的倒计时。



今年冬季，他从郴州再次远贬，“编管”横州(今广西横县)。所谓“编管”，就是秦观要被编入横州户籍，没有人身自由，由横州地方官严加管束。宋朝对官吏的惩处，轻者为“送某州居住”，稍重为“安置”，最重的就是“编管”。

“编管”横州，是秦观自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被贬出京，历杭州通判、监处州酒税、“编管”郴州之后，第四次远贬。这对秦观是精神上的致命一击。而且从那时起，他有了强烈的预感：自己无法生还家乡，“乡梦断，旅魂孤”。而且，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休言七十古稀有，最苦如今难半百”。

秦观的预感是对的。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八月十二，他就在仅仅52岁的年纪撒手西去。史书如是描述他人生的最后时刻：“徽宗立，复宣德郎，放还，至藤州，出游光华亭，为客道梦中长短句，索水欲饮，水至，笑视之而卒。”

直到最后一刻，秦观仍然放不下他的长短句，仍然在向别人讲述刚刚在梦中所作的《好事近·梦中作》：“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飞云当面化龙蛇，天矫转空碧。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吟完这首绝命词，水至不饮，秦观笑视而卒。

秦观的悲剧结局，源于22年前的那个夏天。

那是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的夏天，赴京应举的秦观，在路过徐州时去见了一个人。他就是当时的徐州知州——大名鼎鼎的苏轼。这是秦观和苏轼此生的第一次见面。秦观在留下“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的诗句之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徐州去赶考。

不得不指出，秦观在刚刚应举、即将踏入官场时，先去与苏轼订交，成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在学问上也许是大有裨益的，在政治上却是幼稚的。这直接为他一生的悲剧结局埋下了根源。

苏轼属于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秦观这样做就等于昭告天下：自己已经在“新党”和“旧党”之间提

前选边站队，加入了“旧党”。

而事实上，从秦观留下来的政论文章来看，他的底色却并不是完全完全的“旧党”。比如在《治势》一文中，他就对王安石变法做过中肯的分析，认为新法本身的确是救国救民的良策，只是在执行过程中有些操之过急和矫枉过正，所以才产生了一些弊端，但不能因为这些弊端而尽废新法；在《论议》一文中，他又对免役法、差役法之争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可以综合二法的长处，另订新法，进行改革。

与苏轼徐州初见之后的第二年，两人又见了面。这年三月，苏轼由徐州徙任湖州，途经秦观家乡高邮，于是两人一起乘坐苏轼的官船，游览无锡、杭州、湖州等地。然而，这年七月风云突变，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几经营救才保住脑袋，贬官黄州团练副使。

苏轼这次祸从口出，祸从文出，为不连累朋友，尽量不与人往来，也尽量不写文字，“轼自获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某自窜逐以来，不复做诗与文字”。这是苏轼人生中最倒霉的时刻，也是他深味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时刻。

然而，秦观自苏轼出事之后，多次致信相慰，并且指出，在这件事情上苏轼有“三不愧”：“以先生之道，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内不愧心。”因为感念秦观患难不弃的友情，苏轼给秦观写了长达千字的复信，向他乐观地讲述了在黄州的生活情况。

这次苏轼的霉运持续了整整四年。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四月，宋神宗亲下手诏，将苏轼调任汝州团练副使。苏轼在上任途中，于这年八月十九到达仪真，秦观自高邮来见。大难之后重逢，分外亲热。

苏轼看到此时的秦观，已36岁，却科场蹭蹬，还未中举。患难见真情，苏轼决定帮帮这位真朋友。但此时的苏轼仍然处于自身难保的状态，而且朝中大佬均是政敌。为了秦观，苏轼打算以“旧党”领袖的身份，去请求“新党”领袖王安石。苏轼知道，王安石和自己虽然政见不同，但有相同之处：两个人都是读书的人，都是爱才的人，也都是正直的人。

王安石的反应果如苏轼所料。他在《回苏子瞻简》中写道：“得秦君诗，手不能舍。叶致远远见，亦以为

清新妩丽，与鲍、谢似之。”苏轼与王安石联手赞誉，果然其效如神。第二年春，秦观登第，除蔡州教授。

接下来的元祐年间，尽废新法，尽逐“新党”，全面起用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苏轼、秦观自然也在重用之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苏轼以起居舍人为中书舍人，又升为翰林学士、知制造。不久，苏轼即以贤良方正举荐秦观来京任职，秦观后来得任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国史院编修官。

这段时间，苏轼与秦观等“苏门四学士”均在京师，同在馆阁，济一堂，频频雅集，诗酒唱和，度过了人生中一段美好的黄金时光。

可惜，美好时光总是短暂。公元1094年，宋哲宗开始亲政，改元“绍圣”。宋哲宗要继承父亲宋神宗的遗志，重新推行新法了。由此，宋哲宗全面起用“新党”，贬斥“旧党”，苏轼、秦观等人纷纷被贬出京。

秦观这才来到了郴州，并且写下了《鹊桥仙·七夕》。那么问题来了，如此深情款款、缠绵悱恻的一首词，秦观到底是写给谁的呢？

有人说是写给皇帝的，也有人说是写给元祐党人的。如果说这样一首深情款款的词，秦观是写给男人的，我不信，还是来看看秦观有可能写给哪些女人吧。

首先，肯定不是写给苏小妹的，因为史上并无苏小妹其人。

很有可能是写给秦观真正的妻子徐文美的。徐文美系潭州宁乡县主簿徐成甫的长女，于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嫁给秦观。到秦观写出《鹊桥仙·七夕》之时，两人已是30年的结发夫妻了。考虑到流放生活不便，秦观并没有把妻小带到自己的贬谪地来，而是安顿在扬州。此时在郴州的秦观，思念在扬州的妻子，写出《鹊桥仙·七夕》。

但是，《鹊桥仙·七夕》最大的可能，是写给秦观此前一年认识的一个女人的。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秦观孤身一人，由处州前来郴州，途经长沙时，结识了一位“长沙女妓”，她对秦观倾慕至极。秦观为她连赋三词，分别是《木兰花·秋容老尽芙蓉院》《阮郎归·潇湘门外水平铺》《减字木兰花·天涯旧恨》。

(本文选自章雪峰著《藏在节日里的古诗词》一书，有删节，该书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9年3月出版)

“北京的建筑立在路旁，北京的长城弯弯曲曲地盘在山上，以其雄伟、华丽、端庄、气派，吸引着各地的人，也感动着北京人自己。这其中必有它的道理。看完这本书，也许你能对它的原因品出一两分来，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张克群说。

张克群1961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师从建筑学家梁思成，现为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毕业后，张克群一直从事建筑设计工作，早在1993年就开始了北京古建筑的考察和写作工作，最先写的是北京旧时的庙宇、教堂等宗教建筑，向读者普及宗教仪式和建筑的关系。《北京古建筑物语》就是她退休后花费十年时间，查阅资料、实地探访的心血之作。

《北京古建筑物语》一书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并于近日在北京京华印书局旧址举行了主题为“寻找古建筑背后的老北京”的新书分享会。活动现场，张克群与评论家解玺璋共同为读者讲述了京华印书局的建筑特征与历史往事，同时带来了一场关于老北京古建筑知识与保护的分享会。

张克群待人接物时的自然与幽默性情也表露在这套古建筑知识普及读物中。书中没有晦涩深奥的学术词语，而是用聊天的口吻把关于建筑的冷知识、背景和历史娓娓道来，在讲述建筑知识的同时激发读者对古建筑的兴趣。

古建筑的修复与保护时常引起人们关注与讨论，张克群以呼吁提高古建筑保护意识为己任，但同时她更主张“理性”保护。“我不主张拿水泥、钢筋混凝土模仿古建筑，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貌。古建筑修复也是，应当整旧如旧，让人们感受到它的沧桑。”谈及宣传和保护古建筑的现实意义，张克群说，“我觉得有必要让大家了解中国的古建筑，因为我们说要文化自信，你得知道自己有什么好东西，你才能自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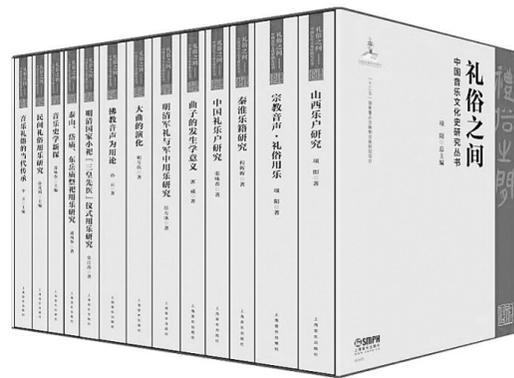
《北京古建筑物语》 寻找古建筑背后的老北京

本报记者 李雨潇

据介绍，《北京古建筑物语》包括三册，《红墙黄瓦》写皇家建筑，《晨钟暮鼓》讲的是宗教建筑，《八面来风》则写外国人在北京留下的早期建筑。张克群还为该书手绘了百余幅图片，生动直观地还原了建筑的样貌和结构。

解玺璋评价，此前有很多讲古建筑的书，也有一些外国人写的介绍中国古建筑的书籍，但大多以文学文采见长，关注的是建筑背后的历史故事；张克群的不同之处在于从建筑师视角为普通读者解构原本艰深的建筑学问，填补了建筑图书类别的空白。

“礼俗之间”丛书聚焦中国音乐文化史



本报讯 7月25日，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礼俗之间：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丛书在京发布。丛书共13卷500万字，是“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并入选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该丛书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音乐学家项阳带领其硕博研究生团队历时24年完成。秉持中国音乐文化史发展“礼乐—俗乐两条脉”的总体史观，丛书从研究乐籍制度出发，内容涉及乐户、乐籍、礼乐、曲子、军乐、大曲、宗教音乐、礼乐、鼓吹、戏曲、曲艺、民歌、乐谱、音乐会社等诸多音乐形态与音乐事象，包括礼乐制度、音乐本体比较、制度与礼乐、制度与俗乐、制度与军乐、制度与宗教音乐六大方面。

上海音乐出版社社长、总编

辑费维耀表示，这套丛书从人类学、文化学等多学科视角切入，以历代社会制度为主线，注重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察相结合，集成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新成果、新范本，开创中国音乐学研究新视野、新方法，相信丛书的出版将推动中国音乐研究向纵深拓展。

相关专家对这套丛书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认为，丛书探讨了中国音乐历史、中国传统音乐、中国音乐文化相关问题，传承了音乐学家秉持钻研中国音乐、探研中国音乐历史、发扬中国音乐文化精神的学术传统，见证了当代中国音乐学术的发展以及中国传统音乐在当下的传承、发展与境遇。丛书的出版对于构建中国音乐话语体系，宣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引领意义。(皓月)

《周国平少年哲学智慧书》发布

本报讯 (记者胡克非)知名哲学家、作家周国平新书《周国平少年哲学智慧书》发布会7月11日在北京举办。阅读推广人、童书出版人三川玲和家庭教育专家尹建莉与周国平围绕“哲学·阅读·教育”展开对谈。

《周国平少年哲学智慧书》一书由博集天卷旗下童书品牌小博集出版发行，是一套适合少年阅读的哲思作品。书中，周国平针对种种困扰孩子成长的话题，结合哲学思维，做出了适合中国孩子的问题。在“所有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都会出现好奇心觉醒的

时刻，面对成年人已经习以为常的世界，他们提出了绝大部分成年人没有想到也回答不了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是从古至今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毕生的追求。”周国平说，“我不主张在孩子小时候特意让他们读哲学书，尤其是哲学知识类的书，这肯定是让他们讨厌哲学最好的办法。父母、老师在孩子的哲学教育中，最重要的是要留心倾听孩子的问题，鼓励孩子思考这些问题，并且与孩子讨论这些问题。这其实才是最最重要的哲学教育。”

新诗：超越时代才能走向远方

本报记者 党云峰

诗歌表达和抒发着历代诗人对家国、民族和时代的歌颂与赞叹，古体诗的辉煌记载了中华文化的绵长渊源，新诗见证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但在处理新诗与传统、诗人与时代等问题上还有很多争议。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业内专家学者。大家提出，思考在知识结构、经验积累相对完备的基础上，如何超越前人所建立的诗歌范式，是探索更有创造力的表达方式的重要途径。

百年来走过的弯路

新诗走过百年，不少诗人以独特的个性，在诗的节奏、韵律、与古典的融合、与世界的接轨方面有孜孜不倦的追求，但也走过很多弯路，例如胡适主张“有什么话，写什么话”；郭沫若没有严格的韵律和节奏要求；1921年到1925年，还出现了冰心的《繁星》《春水》这种风行一时的完全不讲韵脚和形式整齐的小诗。学者汪再兴认为：“虽然这种自由体诗是对旧体形式束缚的否定，但它本身就包含着否定自身的因素，过分的自由使新诗逐渐丧失了诗的味道和美感，特别是一些内容空泛而徒具自由体形式的新诗，败坏了新诗声誉。”

“新诗流派纷呈，可是很多流派的宣言写得仓促，在对西方文艺理论并没有深入研究、深入理解的情况下，进行浮浅甚至扭曲的实践，对新诗的发展是极为有害的。”汪再兴说，值得注意的是，七月诗派一方面坚持艾青所大大拓宽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一方面又给自己的艺术发挥留有足够的余地。在诗歌艺术风格 and 艺

术技巧等问题上，七月诗派只是在大指导原则上要求一致，并没有具体的条条框框，才没有“窒息”他们在艺术风格多样化方面的努力。

悲壮的“力拔山兮气盖世”，豪迈的“大风起兮云飞扬”，深情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正因为长久以来诗人在创作中所展现的不同美学价值，才造就千姿百态的诗歌作品。学者马慧聪认为，即使在创作日常化、题材生活化的今天，诗人也应该在作品中体现独到见解和对美的发现。写作的生活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诗歌创作的“量”，却忽略了创作的“质”，进而造成了对诗歌创作环境的破坏。

诗歌与时代的互动

废名、卞之琳、冯至、穆旦等诗人的实践启示着年轻诗人，外国诗歌的大量译介及翻译水准的提高，也丰富了新诗的资源。诗人臧棣认为：“诗必须对时代做出某种反应，最终必须归结为对时代的超越。”“反应”这种单向度、被动式的阐述，弱化了诗歌的独立性，不能充分揭示诗与时代互动的深层关联。诗人马骥文认为，这种超越不是脱离时代，而是在自我辨的过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与孤绝的勇气，以更恰当和准确的方式进入时代。在这个过程中，诗一定要突显自身的力量，换句话说，诗必须与时代擦出火花。诗人在语言技艺上的精进和成熟，是在跟时代的互动中完成的。

“诗歌之所以如此重要，不仅在于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观察和想象世

界的视角，还在于人们通过诗歌能够对身处的时代作出整体判断，对揭示这个时代的精神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学者唐小林说，“诗歌作为一种能够提供审美视野和精神内景的语言现象，既帮助人们重新建立起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同时也在不断创造出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超越性图景。诗人通过诗歌创作检测和锻炼自己关切现实的能力，在自我精神的探索之外，也在寻找和确立自我在社会参与中的位置。”

“诗与远方”在大众文化中的流行，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诗歌在公众视野中的符号意义。学者杨君尧注意到由此所产生的怪象：当代诗歌在表面上似乎在走向“繁荣”，但在文体意义上可能仍在持续走向“边缘”。诗仍处在边缘，但被作为生活方式的“诗”成为生活方式的代言。大众接触诗歌景观或诗人形象的次数也许大于诗歌文本。诗歌更多是以“被观看”而不是以“被阅读”的方式存在。当“诗”与“远方”并肩步入大众的文化视野时，大众所关注的“诗”已非文本本身，看重的也并非其内在的艺术价值，而是一种可被消费的符号。

开掘新方向，塑造新品格

无论是古体诗还是新古典诗，兴起都是写作中的第一道关隘。学者李啸洋说，古典诗的兴是整体的，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诗词语库构成了庞大的意义参照系，这是新诗写作者的指南针。新诗的兴是局部的，更多依赖古典诗创设的语境，